

长歌当哭——追怀兴国先生

胡 令 远（复旦大学）

得知兴国先生辞世的消息，适值中华日本学会2017长春年会期间，顿生「遍插茱萸少一人」的悲凉遗憾之感！第一反应是由长春直奔沈阳去送兴国先生一程，但一是虽有预感而未料到来得这么快，当时预定返沪另有急务；二是想起幼年丧母寄居外家初归贾府时，作为亲舅舅的贾赦在第一时间不见林黛玉的理由是「不忍相见」。年轻时读到此处不甚了了，待徒增马齿后，方深味生者面对逝者时，其间悲哀的深长与多样！随托与会的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铁军教授代为致祭。

与兴国先生结缘的年代，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迎来日本研究的高潮期。日本电视连续剧『聪明的一休』在中国演播时引起轰动，如同「新燕报春第一声」，它既象征着中日文化交流将步入一个繁盛期，同时也使该剧主译兴国先生先声夺人，名声鹊起。在其后的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界，聚集了一大批学者。由于声气相投，频繁的学术交往，逐渐形成关系密切的「朋友圈」。其中，北京大学的严绍璁教授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卞崇道先生、南开大学的王家骅教授等资深学者之外，新生代中有所谓「南王北马」及与之比肩的刘建辉等先生。「南王北马」即杭州大学的王勇与辽宁大学的马兴国。两位先生有三个共同点，一是皆身怀精通日语的利器，二是研究日本文化的切入点精准

到位：兴国先生从民俗、王勇先生从史文结合；三是都有超凡的组织和社会活动能力。兴国先生除《千里同风录》等学术专著外，还热心为人作嫁，与刘德有先生共同主编的《中日文化交流事典》，同谭汝谦主编《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》、李书成主编《中国日本学总文献》、关捷等主编《中日关系全书》、田桓主编《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》等，成为当时人们研究日本不可或缺的大型工具书，可谓功德无量。此外，值得称道的是，兴国先生于1995年主持召开了「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历史回顾与展望」国际学术研讨会，并与崔新京先生将会议论文集结集出版，可以说别开生面。其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林昶先生出版了《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》并主编了《中国日本研究的深化及其与世界的链接》，所有这些对我国日本研究的载体所进行的研究与整理工作，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，兴国先生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功不可没。兴国先生长期担任《日本研究》杂志主编、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、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、创建辽宁省留学日本同学会等，为中日文化交流、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贡献了智慧与力量。

如果说上个世纪最后20年间，兴国先生主要作为一个日本文化研究学者的话，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，他主要充当了中日文化交流大使的角色。他先后在日本北九州国际大学、神奈川大学等大学工作，负责这些学校的对交流，特别是交换留学生的的工作。仅我所在的复旦大学，兴国先生几乎每年都带领日本学者、学生来交流；我也曾由他引荐，出席过神奈川大学孙安石教授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。当时，包括复旦大学在该校的很多中国留学生，都对兴国先生交口称赞，无不感谢对他们热心指导和无微不至的关照。日前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，与来自神奈川大学的佐桥亮先生谈及兴国先生，他说多年来兴国先生对他有很多关照和帮助。这都使我联想起兴国先生这些年来为中日学者、学生之间的交流，不辞辛劳奔走于两国之间的匆忙身影。他虽然为此常常自嘲为「劳碌命」，其实我知道这源于他一以贯之的追求与理想。

今年4月，兴国先生再次造访复旦大学，告诉我他得了大病，耽搁了最佳治疗时期，回国尝试中医治疗。其平静的口吻，好像在叙说别人的事情。对兴国先生如此的定力我深感钦佩，同时也积极为他张罗。在向死而生的最后岁月，我看到的是一个对生命充满敬畏和期待、对人生满怀着无限眷恋、对亲人充盈着感恩心情的兴国先生。治病，他以极度虚弱的病体两次往返于东京羽田与上海虹桥之间，中医药石也有猛药，须有坚韧的意志忍受巨大痛苦，但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兴国先生都从容面对和接受。

十数年来奔波于外的兴国先生抱病回到沈阳，在随后发给我的微信中，附了4张近照并有以下附言：“2017年6月4日，在亲人簇拥下，开始归国后的第一次户外散步，面对东去的逝水，好想喊一声，沈阳，我回来了！”不久，我又收到他用微信发来的一张精美的纸笺，其上引用的是汪国真的一首诗：“让我怎样感谢你，当我走向你的时候，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，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……2017年6月25日，归国一个月，感谢所有亲人的关爱！”

兴国先生萃确有大志，天纵聪敏，无论学问还是俗务往往事见机先，善领风标；为人宏阔有大度，热诚豪迈，性情中人。奈何一病不起，遽往彼岸！长歌当哭，聊撰小文，以副友情，并为薄奠！

（丁酉年冬日于春申西埭）